

生活圈、社會資本與貧窮

張清富

壹、前言

傳統上，一般都以經濟發展解決貧窮問題。然而，最近世界銀行認為不能單靠經濟援助對抗貧窮；相反地，無論在宏觀（如國家）或微觀（如社區或個人）的層面上都可發現社會資本對貧窮的影響，這在研究及實務上亦有其成果，因此，營造社會資本才能根治貧窮問題（Grootaert and van Bastelaer, 2002; Isham, Kelly, and Ramasmamy, 2002; Saegert, Thompson and Warren, 2001）。社會資本理論強調微觀與宏觀過程的連結，這和社會工作環境中的個人觀點（person-in-environment perspective）相一致（Osterling, 2007: 125）。

既然社會資本對貧窮的影響如此重要，在文獻上大力說明社會資本而廣為人知的就屬 Putnam 了。他在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Putnam, 2011）一書中，認為網絡（networks）、規範（norm）與誠信（trust）是構成社會資本的三大要素。在該書中，作者認為社會網絡影響社區的興衰，因此，社會資本/網絡對貧窮有

重大影響力。

雖然近二、三十年來，有關社會資本/網絡的研究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之一，其應用層面也相當廣泛。社會科學各領域（如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人類學等）使用社會資本解釋種種廣泛的問題，其範圍從大規模的問題如國家經濟發展到民主的興衰，到小規模的議題如各種社會問題對鄰閭的影響等（Osterling, 2007: 125），都是社會資本論述的議題。例如，對於企業的研究（Numazaki, 1986），或是社會學的研究（Lin, 2001），都屬於社會資本研究的主題之一。

雖然，社會資本的研究應用層面廣泛，但運用社會資本探討貧窮議題卻是晚近的事（Osterling, 2007; Wolf, 2007），臺灣也不例外。長久以來，臺灣對於貧窮議題的探討較著重於致貧因素、家庭結構、貧窮線及社會救助等的探討，但對社會網絡/資本的議題對貧窮的影響著墨並不多（萬育維、施教裕，1993；李孟修，1993；吳寧遠，1994；陳心怡，2004）。

本文首先說明在生活圈中社會資本的重要性，接著指出最近有關社會資本對貧窮影響的研究。由於國內這方面的研究並不多，故引述文獻以國外為主，最後為結論。

貳、生活圈的重要性

一般而言，所謂的生活圈可以說是生長在某一環境的人所表現出來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念。我們知道一個人若在某一環境下生活，必然會受到當地環境的影響，表現出其文化和價值觀，由於這種特殊的生活觀念與當事人所接觸的生活環境有關，因此可以說這些人的價值觀可能和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看法有所不同，所以在此情況之下，個人與其家庭必然地會受到此種環境的影響，對人生的價值無法肯定，而缺乏奮發向上的企圖心。這種看法，可以說是在這一生活環境裡所自然產生的特殊文化。因此，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人，由於耳濡目染，學習當地的特殊生活習慣，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有時難免和大眾社會有所脫節，形成一種較為封閉的社會。這就是所謂生活圈的問題。

有關生活圈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右，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研究，這一派的學者把當時芝加哥城的居住環境區分為五個不同的生活圈，各種生活圈的價值觀念和態度以及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差異也很大（Robertson, 1983: 547-550）。他們認為每一生活圈有每一個生活圈的特殊生活方式，由於各種生活圈

有他們本身的特殊文化，因此，每一個生活圈也會由於外在和內在環境的衝擊，而產生變動。芝加哥學派在有關生活圈的研究中認為工人階級生活在離市中心商業區較近的外圍地區，這一地區是屬於流動性較高的地區，匯集各路不同地方來的人，因為這地方房租便宜，離工作地點較近，可以節省交通和通勤時間，因此比較窮的人在剛遷到都市的時候都選擇在這裡落腳，所以這個地方只是他們短暫的棲息地，但卻也因此成為貧民窟的代名詞。這種土地利用的原則，正好反應出當地人主宰其土地利用的最高原則。這種看法充分的顯示出鄰里之間有其本身獨特的自然生活圈存在，這是自然形成的，而非刻意去做的。由此可看出收入和個人居住環境的關係，亦即社會經濟地位和屋齡有密切的相關存在。芝加哥學派的學者認為這種情形和房屋的折舊、房屋價值減少有關，由於屋齡愈來愈高，房屋價值愈來愈低，而收入愈高者總是佔有較優勢的地位，取得較佳的房屋，因此，這些屋齡較高者就成為需求房屋的低收入者所追求的對象。然而，芝加哥學派的說法卻沒有注意到生活圈對當地社會文化影響的過程。換句話說，生活圈有其形成的背景，並非原來就是這種局面。一個地方之所以會成為貧民窟，其實有其發展的過程，隨著地區人口密度的提高，逐漸導致居住在當地的人其社會地位漸漸下降，居住品質漸漸惡化，最後成為低收入者居住的天堂。這種轉變的過程很顯然地和當地社會的變遷有關，也因此成為當地重要的文化根源所在。

由生活圈的看法，可以了解到一個地方的環境如果沒有辦法抵抗外界的入侵，那麼它將轉變成另一種生活形態，這種生活形態是當地人都認同的。然而如果當地人能防止外來的入侵，維護當地的文化，那麼這一地方的價值體系將不會改變。因為有了共識存在，所以當地的規範亦將保存下來。因此，一個地方的環境變動有可能改變當地的人文景觀，然而，更重要的是當地景觀的維繫卻有賴當地人士抵抗外來的入侵。否則，如果當地人都認為環境不好而逃離的話，這就難怪當地的環境和社會價值會改變了。因此，如果能維護當地的一切建設，則一些頹廢的景象將不會出現，而不會愈來愈殘破。因為一旦低收入者愈來愈多，由於他們沒有能力對其居住環境加以改善，由此，更顯示出其貧民窟的特性。

這種情形，我們可以在臺灣找到許多例子，其中尤其以都市地區較容易看出來。例如臺北市有許多平價住宅，福德社區就是很明顯的例子。這平價住宅主要是為低收入者設計的，其內部的格局不大，較為昏暗，光線不佳，加上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從其他地方搬來的，因此缺乏共識，無法形成一個真正的價值體系，所以，髒、亂就成為當地的特徵。然而，在臺北市南京東路、林森北路和長春路之間的康樂里（目前不存在）卻是另一番景象（林麗雲，1991）。康樂里是一個未經政府管理規劃所自然形成的低收入戶住宅區，緊臨這個住宅區的是繁華的林森北路鬧區，一邊是高樓大廈，另一邊卻是由木板、鐵皮或棺木

所建成的避風雨之所，兩相對照之下，差異非常顯著，恰好成為強烈的對比，兩相對照之下，可知這一社區簡陋的程度。然而，我們要問的是難道這些人不想脫離這種惡劣的居住環境嗎？他們當然很想離開那種環境，創造人生的另一面，可是現實的生存問題已經逼迫他們天天去尋求解決每日所需的三餐問題，那有多餘的能力去考慮到未來的事情？此情此景似乎只有經歷過這種環境的人才能體會人生的困境，也因此，他們只求能有一個棲身之所就很滿意，那有其他的非份之想呢？這也就是為什麼低收入戶的居住環境無法改善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低收入者並沒有像一般人所想像那樣，對社區的髒亂感到不滿意，他們對當地社區環境改善的期許比一般人還悲觀，對所居住的社區環境總是逆來順受，很少抱怨，也不相信那種環境有改善的可能。總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低收入戶由於貧窮不得不在衛生欠佳而空間有限的環境中生活，當然在這種情形下，身體、精神和道德的健康都受到極大的戕害。低收入戶民眾常有疾病發生，然而體力的恢復卻需要有一個純淨的空氣和安靜的居住環境以供休息之用，然而，這是其居住環境所無法得到的。所以，如此一來，造成個人罹病率的機會增加，對個人的健康影響很大，以致其就業的意願大為降低，更影響到個人的意志和士氣的低落，再加上狹窄的居住環境，不良的設備，使其人格尊嚴都受到莫大的傷害，沒有精神和勇氣去面對現實的環境，接受人生的挑

戰，這何曾不是個人的悲哀呢？因此，自卑心油然而生，這種情形當然會對個人的小孩造成心靈上無形的傷害，阻礙小孩人格的健全成長。因此，縱使政府有意改善其住宅環境，重建其住宅，使其有較好的生活與居住環境，但是由於當事人能力有限，因此，始終沒有辦法達到這個意願。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環境對個人價值觀的影響以及這種價值觀充分深入社區人心的現象。所以，社區里鄰關係對當地社會環境的維護和社會價值的影響將更為深遠。

參、社會資本的意義

在 1990 年代，社會科學界探討社會資本的議題遠遠超過社會網絡的研究，例如，在經濟學的研究中，社會資本理論的探討超過人力資本與社會網絡的分析（Isham, Kelly and Ramaswamy, 2002）。然而，社會資本理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社會學的功能論傳統，與 Durkheim 和 Tocqueville 的思想相聯結，其後經 Loury, Bourdieu, Coleman, Putnam 等人的提倡（Osterling, 2007），直到 Putnam（2011）的論述才廣為流行。

在此之前，Coleman 曾指出，社會資本是在人力資本創造中的關鍵元素。社會資本是透過特定關係實現的資產，不只團體內的成員受益，整個集體也得到好處。

然而，最廣為人知的，就是 Putnam 了，他認為最近美國的社會資本正在衰弱之中（Putnam, 2011），這種說法 and Fukuyama（2005）的論述一樣。Putnam 定

義社會資本為社會網絡、誠信和互助的規範，並把社會資本聯結到公民社會中的公民德性（2011）。Putnam 相信公民結社組織是一個成功的民主國家中社會資本的骨幹，由此可見在民主社會中，公民結社創造穩定的社會規範，這對社會的凝聚力非常重要，也對社會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另外，他也把社會資本分為黏合式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橋接式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前者指同質性的社會網絡，如親戚或鄰居等，後者指多元群體的網絡聯結，例如久未見面的朋友，他相信這兩種社會資本都對個人或團體有幫助。因此，一個人或社區甚至國家缺乏社會資本，則對個人或社會不只沒有幫助，反而有害。

肆、香港與臺灣的研究

在香港，黃洪（2004）曾在 1999 年 9 月至 2001 年 1 月成功訪問 3,086 個居住在低收入地區之住戶，比較貧窮住戶與非貧窮住戶的社會資本。他以「有多少個親友可以借錢給你？」測量網絡的大小，以「有多少個親友可以介紹工作給你？」來測量介紹工作資訊網絡的規模，以「你有多少個可以信任的親友？」測量相互信任網絡的規模。他的研究發現貧窮人士的社會網絡規模較小，而信任的網絡規模也不大，其中可以介紹工作的網絡規模最少；另外，貧窮人士社會網絡出現同質化。

此外，陳心怡（2004）針對臺灣客家人中低收入戶內之就業者的研究發現，核

心家庭與分家後之親屬網絡結構，是從居住環境與空間的有形距離所產生心理社會支持與社會資本提供的限制。因此，分家與家庭結構變遷過程，是客家族群從集體主義（宗族經濟與社會網絡）轉向個人主義的經濟與社會網絡，連原生家庭兄弟姊妹也僅在經濟有危急才予以協助；親戚互動分為姻親與血親，其互動方式也不相同。血親的互動較有經濟上的來往，而姻親多侷限於社會性的互動（包括婚喪喜慶與廟會慶典），也就是說實質的經濟互動並不多，甚至幾乎不來往的比例幾達 5 成，根本無社會網絡存在的意義。因此，從伙房與分家來看，客家族群陷入工作貧窮與分家（100%）所影響經濟支持是高度有關。

另根據臺閩地區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2002：37），低收入戶接受社會網絡救助是主要來源，以分戶之父母兄弟姊妹及子女最多（36.1%）、次為親戚（17.77%）、朋友（13.01%）、鄰居（6.32%）。其救助在協助急難而非解決貧窮現況，對脫貧與改善貧窮無實質之助益。

上述的說明顯示，貧窮缺乏高地位的個人（high status individuals）（Liebow, 2009；Wolf, 2007: 50），作為其社會資本的核心，引導其得到更有效或獲得更好、更穩定的工作，因而無法脫離貧窮的困境。

伍、結論

最後，以 Putnam 曾對美國密西西比州李縣（Lee County）由貧窮轉向富裕有生

動的描述，作為本文的結尾。Putnam 說：

1940 年，密西西比州的圖佩羅（Tupelo）是全國最窮的州中最窮的幾個縣之一。它沒有獨特的自然資源，沒有龐大的大學或產業規劃來支撐它的發展，沒有高速公路，附近也沒有人口中心。更加糟糕的是，1936 年還遭受美國有史以來死亡人口第四高的龍捲風的襲擊。在接下來的一年，這裡唯一重要的一所工廠也在嚴重分歧的罷工之後關閉。一位受過訓練的社會學家，本地人喬治·麥克林（George McLean）在此前後回到家鄉經辦地方性報紙。通過非凡的領導才能，他把圖佩羅的商業和公民領袖都團結在一個信念周圍，即市鎮和李縣（Lee County）周邊地區只有作為一個社區來開發，它們的經濟才能發展。考慮到該縣的棉花經濟前景黯淡，麥克林最早說服地方商業領袖和農民用他們的錢合夥購買種牛。該行動後來被證明是一個賺錢乳業的開始，增進了地方收入，因而也使得經濟上更加繁榮。為了建立一個較少等級的社會秩序，市鎮的精英商會被解散，同時，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社區發展基金會（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開始步入正軌。該基金會工作包括提高地方學校、發起社區組織、建設一所醫療中心和創建一所職業教育中心。與此同時，除非能為所有雇員支付高薪水並且以此為目標，這樣的商業才能受到居民的歡迎。農村發展理事會（Rural Development Council）在邊遠的地區建立起來，以促進自助性的集體行動--從技術培訓到地方清潔運動--在這些過去曾經反文

化的環境中，為實現共同目標而產生了合作行動。

在此後的 50 年裡，在麥克林和他繼任者的領導之下，圖佩羅成了全國的社區和經濟發展的模範，取得了許許多多的獎勵，也吸引了不斷到來的參觀者，這些參觀者渴望在他們自己的社區複製這個市鎮的成功。自 1983 年以來，李縣一年增加一千個工作崗位，吸引了上億萬美元的新投資，造就了無可辯駁的密西西比州最好的學校體系，建立了一所世界級的醫院，並且把失業率和貧窮率較好地保持在州的（有時候甚至是全國的）平均水平之下。社區的成功是基於它毫不動搖地堅持這樣一個信念，即公民只有集體地追逐目標，人才受益。今天在圖佩羅，一個人要想不參加社區領導而享受社會重要成果是不可想像的。圖佩羅居民投資於社會資本--合作的網絡和相互信任--並獲得了確實的經濟回報。(Putnam, 2011: 376-377)。

上述的例證說明社會資本/網絡對社區從貧窮到富裕的重要性。臺灣也有這樣的例證，例如，電影「拔一條河」所描述的高雄市甲仙區充份利用社會資本/網絡達到成功就是一顯著的例子。2009 年 88 風災過後的甲仙，飽受雨水的蹂躪，當地居民生活陷入極端困苦的境地、其後藉著甲仙國小拔河隊得獎，激發當地大人重拾信心。因此從冰店老闆、便利商店老闆、教練、小選手、外籍配偶...等，各自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同時大家不分彼此，同心協力，恢復信心，努力改善甲仙的生活環境，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漸漸促成甲仙重返榮耀。因此，在此也期待有更多的社區充份利用社會資本，達到繁榮之路。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

關鍵詞：生活圈、社會網絡、社會資本與貧窮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統計處，2002，《中華民國九十年臺閩地區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臺北市：內政部統計處。
- 李孟修，1993，《我國老年貧窮過程與社會支持網絡運用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臺北市：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林麗雲，1991，《中國人的貧窮文化》。臺北市：張老師。
- 吳寧遠，1994，〈貧窮家戶之研究〉。頁 49-86，收錄於吳寧遠主編，《家庭與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中心。
- 黃洪，2004，〈香港邊緣社群社會資本的貧乏〉。《The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38(1/2): 53-71.
- 萬育維、施教裕，1993，〈貧困老人社會支持網絡之研究〉。頁 C-1 至 C-7，收錄於國立

-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社會不均與貧窮研究》大型規劃案。
- 陳心怡，2004，《以社會關係網絡分析客家人工作貧窮問題》。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Fukuyama, Francis 著，李苑蓉譯，2005，《誠信：社會德性與繁榮的創造》。臺北：立緒。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Paperbacks.)。
- Grootaert, Christiaan and Thierry van Bastelaer (eds.), 2002;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sham, Jonathan, Thomas Kelly, and Sunder Ramasmamy(eds.),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Isham, Jonathan, Thomas Kelly, and Sunder Ramasmamy,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Wi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Introduction." Pp. 3-17 in Jonathan Isham, Jonathan, Thomas Kelly, and Sunder Ramasmamy(eds.),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Liebow, Elliot 著、黃克先譯，2009，《泰利的街角》。臺北市：群學。(Liebow, Elliot, 2003,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Lin, N.(林南),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umazaki, Ichiro, 1986, "Networks of Taiwanese Big Business : A Preliminary Analysis." *Modern China* 12(4): 487-534.
- Osterling, Kathy Lemon, 2007, "Social Capital and Neighborhood Poverty: Toward an Ecologically-Grounded Model of Neighborhood Effects."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16(1/2): 123-147.
- Putnam, Robert 著、劉波、祝乃絹、張孜異、林挺進、鄭寰譯，2011，《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弱與復興》。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Putnam, Robert,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obertson, Ian, 1983, *Sociolog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 Saegert, S., J. P. Thompson and M. R. Warren(eds.), 2001, *Social Capital and Poor Communiti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Wolf, Jennifer Price, 2007,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Poverty in Urban America."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16(1/2): 41-56.